

## 東歐勞工運動的變遷

● 奧斯塔  
(David Ost)

自從斯大林主義壽終正寢以來，在東歐掌握着統治權的共產黨，基於一種非正式的社會契約，大體上一直維持着穩定的局面。但舊體制的消亡導致了大蕭條，工業產出、消費需求和工資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滑坡，而且伴隨着使儲蓄大大縮水的嚴重通貨膨脹。在共產黨垮台後的一年內，大多數工人的生活與舊體制時的情況相比變得十分糟糕。

當共產制度1989年在東歐崩潰，兩年後又在蘇聯垮台時，當地和外國的大多數評論家都認為，建立「民主和市場經濟」是這些國家在新時期面對的兩大基本挑戰。他們所說的「民主」，是指建立有意義的議會、真正的政黨和獨立的司法，以及在評論它們上享有充分自由的媒體。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則是指產業私有化、建立資本市場和形成一個有足夠財產來控制這一切的階層。可是幾乎誰也不曾去討論從許多方面看最根本、最具潛在破壞力的挑戰：工人的生活、行為和期望的變化。

自從斯大林主義壽終正寢以來，在東歐掌握着統治權的共產黨，基於一種非正式的社會契約，大體上一直維持着穩定的局面。在這種安排之下，工人有望獲得一份工作，生活水平也會得到緩慢而穩步的提高(包括等上十來年後能夠住進一套公寓)，還有寬鬆的勞動紀律。作為報答，他們必須接受執政黨的政治權威和經過粉飾的公共生活。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則並非這樣的。那兒的人沒有得到一份工作的預期，也不存在使全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保障，為了確保生產率的提高和增加資本收益，勞動紀律十分嚴格。人們也不必接受一黨統治。

從長遠的角度看，大多數資本主義經濟體確實給很多工人提供了回報，他們要麼確實得到了這種回報，要麼相信將會得到回報，這兩種情況都使得市場經濟的政治和經濟比較穩定。然而東歐和前蘇聯的問題是，舊體制的消亡導致了歷史性的大蕭條，工業產出、消費需求和工資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滑坡，而且伴隨着使儲蓄大大縮水的嚴重通貨膨脹。在共產黨垮台後的一年內，大多數工人的生活與舊體制時的情況相比變得十分糟糕。

可以說，後共產時代的政權在這種局勢下面對的關鍵挑戰，就是如何應付工人的不滿。在一個民怨沸騰的時期，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如何爭取人民去支持一種他們覺得不能給他們提供幫助的制度？

本文將從不同的側面探討東歐後共產時代轉型過程中的勞動者。我首先要考察一下勞動者對後共產時代的危機作出的反應，然後討論新政府試圖用來處理勞工關係的一種方式，即三方協商制度。接下來我將談談這個地區最近出現

的勞工運動復興的跡象，評估其未來的各種可能。我認為，歷史的遺產使得勞工運動仍然難以使自身利益得到伸張。最後我將把中國和東歐做一比較，希望解釋一下東歐勞動者的軟弱無力為何看起來與中國的情況大不相同。

## 一 後共產時代勞動者的沒落

工人之所以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共產體制造就了一個工業社會，而不是一個後工業社會。當這種制度最終崩潰時，它沒有表現出後工業社會的任何特點——凋敝的工廠、繁榮的服務業、衰敗的城區和欣欣向榮的郊區。共產體制創造了一個工業社會，並且在這個社會中壽終正寢。當這種體制結束時，與日益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的西方相比，東歐各國有着更多在大工廠裏從事藍領職業的工人。正如一位作者所說，共產黨政府成功建立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後十九世紀經濟」<sup>①</sup>。這種經濟最出色的表現，就是創造了大量的工人階級。

統計數字表明，東歐人口在工業和建築業就業的比重大大高於西歐（見表1）。這一數字從波蘭的36.3%到捷克斯洛伐克的49.8%（波蘭的數字實際上要更高一些，因為許多從事農業的人口，要用在工廠做鐘點工的工資補貼家用）。西歐國家的最高數字是前西德的39.1%，但這個國家一向以工程見長，是工業品出口的世界領袖。

正是這些脆弱的部門有如此之多的就業人口，使局勢很快就變得十分糟糕。國家決定放開價格、取消補貼，允許外國商品跟國內產品展開競爭之後，衰退現象接踵而至。消費者現在能夠看到跟國產貨價格差不多的西方商品，他們長期聽說後者如何如何優越，便忙不迭地抓住機會，通過擁有西方的商品以獲得一種自己也是西方人的感覺。很多經濟學家呼籲提高關稅壁壘，保護弱不禁風的國內產業，但是東歐卻選擇了比西方更大的開放度——這要部分地歸因於西方的要求，由於東歐各國希望加入歐盟，所以對這種要求十分敏感<sup>②</sup>。結果是國內生產一落千丈。在共產黨垮台後的一年裏，整個地區的工業產

共產黨政府成功建立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後十九世紀經濟」。這種經濟最出色的表現，就是創造了大量的工人階級。當這種制度最終崩潰時，它沒有表現出後工業社會的任何特點——凋敝的工廠、繁榮的服務業、衰敗的城區和欣欣向榮的郊區。國家決定允許外國商品跟國內產品展開競爭之後，衰退現象接踵而至。東歐選擇了比西方更大的開放度，結果是國內生產一落千丈，在共產黨垮台後的一年裏，工業產出下降了大約三成。

表1 在工業和建築業就業的勞動力百分比

波蘭	36.3
匈牙利	38.3
蘇聯	38.9
羅馬尼亞	43.1
保加利亞	46.6
東德	49.4
捷克斯洛伐克	49.8
荷蘭	23.9
比利時	25.1
加拿大	25.6
美國	26.7
英國	26.7
法國	27.2
意大利	28.2
瑞典	29.0
西班牙	30.4
日本	33.5
瑞士	37.4
奧地利	37.5
西德	39.1

資料來源：Rocznik Statystyczny 1991 (Warsaw: GUS, 1991), 500, xxv.

註：除了捷克斯洛伐克（1980）、保加利亞（1985）、比利時和瑞士（1986）以外，其他所有數字都是指1987-1989年。

出下降了大約三成。這是自大蕭條以來和平時期出現的最嚴重的經濟萎縮<sup>③</sup>。實際工資下降了兩成——俄國的降幅甚至更大。這種嚴重衰敗的現象在現代經濟中十分罕見。

## 二 勞動者的反應

很多人以為勞動者會強烈抗議後共產時代生活水平的下降。他們雖然並不懷戀共產體制（這大體上是因為原來的「社會契約」所承諾的經濟福利正在迅速衰退），但是後共產時代最初幾年出現的經濟衰退，卻是一種始料未及的打擊。不過，這些地區很少發生勞動者的抗議行動。許多人預計波蘭人的怨氣最大，因為他們有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團結工會成立於1980年，是共產國家集團中的第一個獨立工會。政府曾試圖加以阻止，但是1980年的全國大罷工迫使政府作出讓步。十六個月後政府進行改組並實施了軍管法，團結工會遭到取締<sup>④</sup>。不過這場運動在80年代卻在地下生存下來，並於1989年迫使政府坐到了談判桌前，從而在該年啟動了整個東歐的革命。由於這一運動的強大勢力，很多人預期團結工會不會接受勞動者受到的打擊。

實際情況卻是，團結工會大體上接受了變化。這是因為團結工會的前領袖在1989年已經變成了政府領導人，他們說服工會把政府的計劃作為工會的計劃加以接受。團結工會的官方報紙《團結周刊》(*Tygodnik Solidarnosc*)呼籲工會會員「積極配合(或至少是默認)縮減開支、勒緊腰帶和增強勞動紀律的政策」<sup>⑤</sup>。連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Lech Walesa)也站出來反對建立強大的工會組織。

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工人也持有類似的看法。既然共產制度一向猛烈抨擊「資本主義」，而大多數工人活躍份子認為敵人的敵人肯定是他們的朋友，所以他們都歡迎引入資本主義制度。不過，除了這些妨礙抗議活動的意識形態因素外，經濟因素也在阻止勞動者進行反抗。簡單地說，在失業有增無減的時期，佔優勢的是僱主。連許多技術工人都丟掉了飯碗，有安全感的人也就寥寥無幾了。罷工和抗議有着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風險，所以這種事情很少發生。勞動者認為並且希望自己這種可敬的克制態度應當得到回報，而政府卻利用勞動者沉默不語的機會，在工廠推行更嚴格的管理，擴大工資差別，以及為一個新的精英階層培植勢力的私有化方案<sup>⑥</sup>。

因此，90年代初期的一個突出特點，大概就是勞動者出人意料的軟弱無力——這種軟弱無力意味着，工人和工會不能根據自身利益去塑造公共政策、勞動條件和正在形成的工業關係。他們只能靠邊站，十分消極地看着新精英團體追隨時髦的新自由主義趨勢去改造國民經濟，把政府管制、工會參與和平等的信念通通拋諸腦後。整個東歐的情況概莫能外。勞動者的軟弱無力表現在很多方面：工會會員人數下降，層級制管理方式的興起，集體談判縮手縮腳，達成的協議形同虛設，罷工行動成效不彰，政治結盟不起作用或根本不存在，工會對公共政策影響甚微，工人的物質收入下降等等<sup>⑦</sup>。許多觀察家曾經預測，

勞動者雖然並不懷戀共產體制，但後共產時代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經濟衰退，卻是一種始料未及的打擊。不過，這些地區很少發生勞動者的抗議行動。90年代初期整個東歐的一個突出特點，大概就是勞動者出人意料的軟弱無力。許多觀察家曾經預測，東歐的資本主義會因為傳統的工人勢力而步履蹣跚，然後共產時代的市場化卻締造了一種既有能力也熱衷於把勞動者邊緣化的資本主義。



放棄了共產體制的東歐各國，仍然有一個比中國或越南更好的社會安全網，只要一失業就能拿到失業保險金。全民免費醫療制度較之過去明顯衰落了，但是依然存在着某種基本的全民保險。由於老年人有着不同尋常的高投票率，這使得執政黨在維持老年人津貼的發放上比較大方。圖為波蘭克拉科夫舊廣場旁的咖啡館內情況。

東歐的資本主義會因為傳統的工人勢力而步履蹣跚，然而後共產時代的市場化卻締造了一種既有能力也熱衷於把勞動者邊緣化的資本主義。

這不意味着所有的福利制度都被廢除。相比之下，放棄了共產體制的東歐各國，仍然有一個比中國或越南更好的社會安全網，而這兩個國家卻仍然自稱信奉傳統的社會主義思想。例如，只要一失業就能拿到失業保險金。普遍採用的做法是在規定的時期內領取一定比例的薪水，此後還有可能得到公共救濟金的幫助。比如在90年代中期的波蘭，失業工人可以在十二個月內拿到全國平均工資的36%，超過十二個月以後就有資格得到貧困人口的公共救濟的援助。公共救濟包括對最貧困人口的長期福利援助(平均工資的28%，這仍會使領取救濟金的人處在貧困之中)，以及用於購買衣服或交納房租的一次性支付。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如再培訓和提供公營部門的工作，也是對抗失業的常見方法，尤其是在捷克<sup>⑥</sup>。

全民免費醫療制度較之過去明顯衰落了，因為許多醫院已被改為私營。但是依然存在着某種基本的全民保險。老年人津貼也得到了保留。由於老年人有着不同尋常的高投票率，這使得執政黨在維持津貼的發放上比較大方，所以現在的貧困現象其實更多地集中在年輕人而不是老年人身上。

原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福利制度已經崩潰，為何許多社會福利猶能得以保留呢？原因在於加入歐洲的願望，東歐為此需要提供一些歐盟仍然要求的基本福利。另一個原因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黨需要做一些能夠贏得選票的事情。在中國或越南是不存在這種壓力的。然而如上所言，東歐的福利制度與過去相比確實已經衰敗了，而且這種衰敗很有可能進一步發展。事實上，進一步削減福利的壓力恰恰是來自歐盟。歐盟要求新成員國遵守歐洲貨幣聯盟的規定，把預算赤字維持在低水平上(與以往的歐盟成員國不同，新成員國要在未來幾年內就加入歐元區)。但是，由於經濟增長緩慢和失業的增加，社會福利正在

佔用國家預算更大的份額，從而超過可以接受的赤字水平。因此在未來幾年內，社會福利將進一步下降，儘管它看起來仍然會比中國大方得多。

### 三 三方協商制的試驗：「虛幻的」合作主義

新政府一方面做着一些系統的努力，它將導致工人的邊緣化，破除他們的各種期待。換言之，這種努力是為了塑造一個溫順的工人階級，它與共產黨社會塑造的那種具有主人翁感覺的工人階級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試圖贏得工人的支持。與西歐的歷史不同，這不是通過建立工人階級政黨做到的。在後共產體制的東歐，甚至前共產黨也想代表社會上所有階層的公民，成為一個「兼容並蓄式」的政黨，而不是只為勞動者承擔起責任的政黨。當中最主要機制是「三方協商」(tripartism)的制度。在二戰之後的西歐，這種三方協商機制使勞動者、工商界和政府三方代表坐到一起，努力達成旨在取得社會穩定的協議，是使所謂的「新合作主義」(neocorporatist)安排得以形成的一種關鍵機制。這種經常被人稱為「社會民主黨的合作主義」的安排，在既保障工商業的利潤又促進勞動者利益方面被證明十分成功。它是二戰以後西方「黃金歲月」的核心因素<sup>⑧</sup>。因此，把這種三方協商制度移植到後共產時代的東歐，似乎也為那裏的勞動者提供一個更好的前景。

東歐的勞動者、工商界和政府三方協商制度，頂多可稱為「虛幻的合作主義」，勞動者的參與僅僅是一種假象，政府和工商界都不想討論太多實質性問題。政府把它打算實行的政策徑直通知利益調解委員會，要求它予以認可。當遭工會拒絕之後，政府便自行其是。從1998年開始，利益調解委員會基本上變成了一個為政府強行貫徹新自由主義提供合法性的非正式諮詢機構。

然而結果卻是，東歐的三方協商制度頂多被稱為「虛幻的合作主義」，僅僅是為了提供一種勞動者參與的假象。事實上，政府和工商界都不想討論太多實質性問題。東歐的三方協商模式並非像新合作主義在西方那樣，形成有利於政治穩定和經濟共享的階級妥協，而是被用來幫助向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平穩轉型<sup>⑩</sup>。

讓我們簡短討論一下事情的經過。在東歐，三方協商制度的開先河者是匈牙利。為了推動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該國在1990年成立了「利益調解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早期的主要目標是要以低廉的代價換取勞動者的平靜。它制定了最低支付率的指導原則，使各方坐在一起就部門協議進行談判。但是，這些協議僅僅規定了很低的全國標準（經常是在重申一些落實情況很差的法規），為工資、價格和稅收政策制定沒有約束力的指導原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社會黨（前共產黨）在1994年上台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政府試圖推行深層次的自由化改革，並且希望工會支持一些嚴厲的措施。政府並非提出建議，然後聽取相反的意見，而是把它打算實行的政策徑直通知利益調解委員會，要求它予以認可。當遭工會——雖然許多工會代表也是社會黨黨員——拒絕之後，政府便自行其是，單方面實行了嚴格的預算，修改了工資管制辦法。雖然利益調解委員會仍在開會，它所處的氛圍卻被描述為政府「不拿協商當一回事」：財政部長「希望聽聽具體意見」，但是他所提交的政府計劃「沒有商量的餘地」<sup>⑪</sup>。甚至就在三方協商會議召開之際，社會黨政府就通過了減少工人就業保障的法律（其中特別寬宏大量的一條是，允許外國人的企業隨心所欲地對待

工人)。政府有時確實仍然把自己的設想交給三方協商委員會討論，但是工會一方即使打算反對，也不能做到，因為政府的文件通常是在開會前一兩天、有時甚至是開會當天才發給與會者<sup>②</sup>。從1998年開始，利益調解委員會基本上變成了一個為政府強行貫徹新自由主義提供合法性的非正式諮詢機構。在這一年的議會選舉之後，新右翼政府縮減了調解委員會的議事範圍，解散了所有與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問題有關的三方調解委員會。

總之，匈牙利的三方協商委員會的經驗，既沒有提供冷靜解決衝突的辦法，也沒有像西方的新合作主義那樣帶來經濟增長和勞動者的保障。相反，匈牙利的經驗是一個軟弱無力的三方協商機制，它通過的是一些得不到落實的協議，政府僅僅以傲慢的態度把它當成工具，它沒有能力維護工人的利益，抵禦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進攻。我們在東歐其他地方看到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有意思的是，波蘭是東歐國家中唯一沒有在1989年後立刻引入三方協商制度的國家。但這僅僅證明了新精英團體是把三方協商制度作為一種爭取工人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手段加以利用。在波蘭，沒有必要用三方協商委員會去爭取工人，因為團結工會已經替它完成了這項工作。只是當工人在1993年開始同政府決裂時，政府才把三方協商制作為平息局勢的手段推出。但在隨後幾年，令匈牙利的三方協商制度苦不堪言的事情也在波蘭出現了：政府並不想跟工會談判，它只想利用工會，使它打算採取的那些不利於勞動者的措施得到認可。

各地情況都一樣。1993年國家解體之後，斯洛伐克保留了三方協商委員會，但是麥恰爾(Vladimir Meciar)的政府立刻採取了一系列不尊重工會和三方協商委員會的措施。它一再拖延三方協商委員會的開會日期，單方面違反已經簽署的協議。1997年，政府甚至試圖成立一個自己的假的三方協商機構，只讓少數親政府的小工會參與。當自由派聯盟贏得了1998年的大選後，局勢幾乎仍然沒有絲毫改善<sup>③</sup>。

保加利亞的三方協商委員會在1991年批准了一項旨在穩定宏觀經濟的激進方案，為廣泛的社會倒退打開了方便之門。但是勞動者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回報。設置障礙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國際社會。該國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得到了一大筆救濟貸款，人們總是把它視為勞動者處境無法得到改善的原因。三方協商委員會在90年代末已經變成了一個徒有其名的機構。正如社會學家和工會顧問格雷德(Grigor Gradev)所說，所召開的會議「並不是三方會議，而是四方會議，它的重要合夥人是處在這個制度之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up>④</sup>。

總而言之，在後共產體制的東歐，三方協商制度呈現出一致的模式：不拿工會當回事，協議沒有約束力，私營部門欠缺參與的意願，三方協商制普遍軟弱無能。政府的頑固態度曾導致波蘭、保加利亞、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工會聯合抵制三方協商會議，然而就算他們取得勝利，其收穫也僅僅是得到較為親切和藹的對待，而並非勞動者經濟狀況的改善。當然，如上所說，政府照舊保留了許多社會福利，儘管水平有所下降。政府的說法是，這便是勞動者從三方協商制度得到的好處。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由於政府有着討好歐洲的需要和願望，這些福利無論如何都是會得到保留的。東歐的三方協商制度從來沒有真正

在後共產體制的東歐，雖有三方協商制度，但卻不拿工會當回事，協議沒有約束力，私營部門欠缺參與意願，三方協商機制普遍軟弱無能。政府的頑固態度曾導致波蘭、保加利亞、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工會聯合抵制三方協商會議，然而就算他們取得勝利，也不能改善勞動者的經濟狀況。政府照舊保留了許多社會福利，說這便是勞動者從三方協商制度得到的好處。

成為一個利益談判的平台，它只是一種象徵，用來維持已經和勞動者做過政策談判的假象。它不過是一種虛幻的合作主義。

#### 四 工會復興的趨勢

對於工會來說，後共產時代是一段艱苦歲月，與它有關的一切都在衰敗：會員人數、在工廠中的權威、集體的團結精神、分會數目、企業責任和政治影響力等等。其大部分責任要由工會領袖本人來承擔，因為他們不去盡心盡力地維護自己的工會。缺少技能的底層工人知道自己需要保護，因此仍然相信工會，但是那些有能力領導工會的技術工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已經不再忠實於工會運動的理念了。相反，他們傾向於把自己視為資本主義轉型的受益者，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特別需要工會。

對於工會來說，後共產時代是一段艱苦歲月，與它有關的一切都在衰敗：會員人數、在工廠中的權威、集體的團結精神和政治影響力等等。工會領袖多把自己視為資本主義轉型的受益者，使得工會成員不相信工會。許多工會領袖受到「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冷戰邏輯的腐蝕，不再相信資本主義經濟也有工會存在的必要。但自新世紀初以來，東歐對工會的態度似乎正在變化。

這種引人矚目的態度——工會份子不相信工會——主要歸因於共產體制的遺產。許多工會領袖受到「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冷戰邏輯的腐蝕，不再相信資本主義經濟也有工會存在的必要。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認為，「真正的老闆是不會虧待好工人的」。既然他們相信自己就是好工人，只是過去不得不在社會主義工廠裏幹活，所以他們期待着即使沒有工會，資本主義和私有化也會讓他們掙到更多的錢，過上更好的生活<sup>⑤</sup>。克勞利(Stephen Crowley)和我本人曾經說過：「東歐的勞動者似乎認為，資本主義意味着弱小的工會。他們往往把工會視為保護弱者的機構，主要跟日趨衰敗的國有部門有關，而不是勞動者與資本抗爭的不可缺少的代表，更不是伸張公民權利的代言人。」<sup>⑥</sup>

不過，自新世紀初以來事情開始起了變化。隨着共產體制時代的記憶逐漸淡去，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現實日益凸顯，東歐對工會的態度似乎也在發生變化。造成這種變化的似乎有五個關鍵因素：工會官員的生存需要；加入歐盟；國際勞工團結局面的出現；新一代工人，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後共產時代的結束」。我們下面就來分別談談這些因素。

與工會官員的需要有關的第一個因素是，今天的工會官員已經無法接受其前輩的意識形態信念了。過去，許多最熱誠地信仰市場經濟的工會幹部，他們個人其實也能從社會轉型中獲益。像波蘭團結工會和匈牙利工會聯盟(Liga)這些獨立工會的很多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和知識份子，他們把自己的活動當作反抗權貴私有化體系(nomenklatura system)的一部分。在這種體系崩潰之後，新體制需要新人，他們便最先成為幸運兒。很多人在自己工作的公司裏當上了經理。換言之，第一批工會活動家在工會之外過上了好日子。而今天的工會領袖已經沒有這種機會了。他們不能把自己工會活動家的身份作為政治資本，轉而經商或從政，因為那些位置已經由專家們佔據了。快速升遷的時代已成明日黃花。今天的工會官員如果打算維持自己相對較好的職業，他們只能以工會官員的身份來做到這一點。因此，推動工會發展現在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自身的生存要求他們這樣做。他們改善生活的其他出路顯然已經不復存在。

其次是歐盟的作用。一些改革家，甚至一些工會活動家，或許希望工會消失，可是加入歐盟卻使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歐盟把工會明確作為歐洲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關鍵成份，是歐盟規則所指定的「社會夥伴」制度中的主角之一。因此，儘管歐洲的貨幣統一削弱了西方工會的力量，歐盟卻成為促進東歐工會復興的力量之一。歐盟在過去十五年裏為東歐的很多工會教育計劃提供了資助。加入歐盟似乎意味着，東歐的工會不但必須生存下去，而且至少得表現更加活躍一些才成。

第三是國際勞工團結局面的出現。過去，具有不同意識形態色彩的西方工會——無論是保守的美國勞聯—產聯 (AFL-CIO)，還是支持社會黨的法國工會和受共產黨領導的意大利工會——援助作為反對派的東歐工會，通常都是基於同樣的立場，即它們都是跟專制對抗的勞工和公民社會團體，但是近年來的西方工會涉足於東歐的工會運動，卻是因為全球化。也就是說，西方的勞工領袖認為，既然資本去了國外，他們也得緊隨其後才成。由於彼此相鄰，以及語言和歐盟的緣故，他們在東歐比在東亞更容易做到這一點。於是，工會的援助範圍也超出了弗里德利希·艾伯特基金會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與德國社民黨有關) 的書籍出版和贊助與勞工有關的研究及會議這類活動。在90年代初，因大膽的組織活動而贏得聲譽的美國勞聯—產聯下屬組織服務業僱員國際聯合會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開始在波蘭舉辦新會員的講習班，而在該聯合會的領袖斯威尼 (Joseph Sweeney) 擔任了勞聯—產聯主席後，又為波蘭提供了更多的金錢。當團結工會的幹部深陷於政治活動之中時，他們對這種活動沒有多大興趣，但是當1999年他們的政治力量下降，工會的軟弱表現似乎威脅着它的長期生存時，他們也加入了這種活動，而且成立了一個在新產業中開展組織活動的工會發展部。西歐的工會也變得更加積極。德國工會提供了特別的幫助，使位於東歐的大眾和歐寶汽車廠的工人能夠成立並成功地管理工會。同時，一些外國零售業工人的工會也在東歐的大型超市裏成了組織工會的新動力。

推動東歐工會復興的第四個因素是新一代工人的出現。在二十一世紀初，青年工人開始對工會發生興趣，這是自共產黨垮台以來的頭一回。如前所說，工會在1989年後便成了一種過時的東西。從五一節大遊行到生產力運動，工會一向是這些共產體制華麗表演中的主角，它是與已成歷史的體制，而不是有待創立的體制聯繫在一起的。年輕工人大批離開工會，新的勞動力市場則向他們敞開了大門。除了這種不良形象外，促使工會「衰老」的還有另外兩個因素：新興的私有部門出現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它們都沒有工會，但需要年輕工人；經濟危機使原來有工會的企業無力擴大招工，這使更多的年輕人轉向非正式部門、去國外謀生或是去接受更好的教育。當然，各地的情況不盡相同。在小規模私有化發展很快的中歐國家，年輕人中加入工會的情況尤其多見，因為這種私有化使工會提供的許多基本服務——代購商品、夏季休假和提供住房等等——脫離了工會的控制。但在私有化進展不快的地方，如俄國和烏克蘭，在年輕人中間仍有較多的工會會員，因為工會仍然是一些重要服務的潛在提供者。

在二十一世紀初，青年工人開始對工會發生興趣，私營部門光彩奪目的外表逐漸褪色：嚴格的紀律和過長的工時，踐踏勞動法不受懲罰，報酬太低。曾經在共產體制後期生活過的年輕人，發現資本主義跟舊制度一樣，完全容得下認人唯親、阿諛奉承和裙帶關係。於是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待工會：它不再是一個黯淡無光的歷史陳迹，而是一個未來的潛在保護者。



但是到了90年代末，甚至在中歐也發生了變化，因為這時塑造年輕工人經驗的已經不是「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而是「實實在在的資本主義」。私營部門光彩奪目的外表逐漸褪去。嚴格的紀律和過長的工時，踐踏勞動法不受懲罰，除了一小撮製造業精英以外報酬太低——這些現象不再是長輩和一個日益失勢的政治階層向他們灌輸過的遙遠往事，而是很快就變成了年輕工人的現實處境。曾經在共產體制後期生活過的年輕人，本以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只看重才智和能力的制度，卻發現它跟舊制度一樣，完全容得下認人唯親、阿諛奉承和裙帶關係。於是年輕人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待工會：它不再是一個黯淡無光的歷史陳迹，而是一個未來的潛在保護者。曾在歐盟各國旅遊或生活過的年輕人，對西方工會也留下了更為正面的印象。他們開始認為，工會不是一個過時的利益提供者，而是一個未來的利益提供者。

## 五 後共產時代的結束

最後，在解釋現在的人為何對工會重新發生興趣時，最重要的因素也許僅僅是後共產時代已經在企業中結束。我這裏所說的「後共產時代的結束」，是指1989年以後宏大的歷史性制度變革方案——向市場經濟轉型；解散國有企業；加強勞動紀律；建立階級體系——都已完成。這並不是說它們全都大功告成——這樣說還言之過早，而是說基本目標已經完成。這至少意味着企業已經不再像共產時代那樣，是負責向公民提供就業和社會服務的機構，而是用訓練有素、高效率的勞動力創造利潤的組織。這意味着今天的工會領導人已經不必再對企業中那些他們不太尊重的非技術工人承擔責任了。

為了說明這種現象，我不妨談談不久前的一段往事。我在90年代初與波蘭工會活動家進行長談時，首次意識到後共產時代的工人階級中間存在着這種差

勞動者厭惡共產制度不把工廠視為生產單位，而是把它視為進行社會控制的場所。「後共產時代的結束」，是指1989年以後宏大的歷史性制度變革方案——向市場經濟轉型；解散國有企業；加強勞動紀律。這些基本目標已經完成。圖為波蘭比托姆Centrum煤礦廠煤礦工人換班情況。



別。在經常被人視為軍火工業基地的梅萊茨市 (Mielec)，我同航空製造業工廠的團結工會幹部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當地的工會領袖明確告訴我，他們對自己的工會會員和工會沒有多少自豪感。四十四歲的工會副主席安傑伊 (Andrzej) 說，工會在90年代的工作是「保護失敗者」<sup>⑦</sup>：

工廠的大多數人都不想幹活，他們指望國家來照顧他們。他們向工會發牢騷，嫌自己掙錢太少，他們幾乎對所有的事情都是牢騷滿腹。可是說到底，大多數問題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也有一些不錯的工人，但這種人屈指可數。

就像領導波蘭產業工會的大多數人一樣，安傑伊也是一名技術工人。他反對共產制度，不是因為這種制度給他的報酬不夠多，而是因為它冒犯了他對勞動過程的一種尊嚴意識。他厭惡這種制度不把工廠視為生產單位，而是把它視為進行社會控制的場所。社會主義的工廠是分配福利和維持秩序的地方，它們允許人們幹活吊兒郎當也不必害怕丟掉飯碗。企業的角色其實是福利的提供者，而不是利潤的創造者，這解釋了這種制度為何長期存在經濟問題，為何對經濟學家解決問題的建議置若罔聞。蘇聯的改革家在60年代就指出了社會主義工廠中的經濟問題，然而克服這些問題的方案總是被束之高閣，因為任何這方面的真正努力，都會威脅到作為此種制度之基石的社會契約。共產黨非但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反而維持着一種讓幾乎全體公民(除了非斯拉夫共和國中的非城市地區)在工廠就業的制度，這種工廠管理住房，養着一些文化機構，提供着基本的社會福利。

有可能成為工會領導人的技術工人認為，工廠的問題在於，培養技能與維持秩序相比是等而次之的事情。共產制度對待缺少專長、不思進取的工人是很不錯的，它為他們提供職業、一定的社會保障和歸屬感，較之他們在當前俄國生活惡化、貧困潦倒的情況，那是一段讓他們倍感親切的歲月。但是對於技術工人來說，共產制度給他們帶來的卻是恥辱，它使他們無法從工作中得到滿足，剝奪了他們的抱負和進取心，不給他們提供充分發揮自身技能的機會。共產時代的人抱怨說，「他們假裝付錢，我們假裝幹活」，這往往被人誤解成一種很得意的說法，其實對於那些厭惡只能「假裝幹活」的技術工人來說，它表達着一種怨恨情緒(前蘇聯一些「禁區城市」中的敏感的軍火工業，或東歐那些生產尖端武器的工廠，是唯一能夠施展才華的地方，但是由於1989年蘇聯國家發生的危機，這種職業也迅速消失了)。

這些技術工人在專業人才離開工廠另謀高就之後領導着獨立工會，他們希望後共產時代能夠改變這一切。這就是他們不反對解僱工人的原因。他們和實行市場改革的人一致認為，社會主義的企業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他們希望解僱那些「不務正業的」人——他們同意解僱大多數女性，原因便在於此，由於教育模式的緣故，女性更可能從事一些雜七雜八的工作，即技術工人眼中的「非生產性工作」。

對於技術工人來說，共產制度使他們無法從工作中得到滿足，剝奪了他們的抱負和進取心，不給他們提供充分發揮自身技能的機會。共產時代的人抱怨說，「他們假裝付錢，我們假裝幹活」。技術工人希望後共產時代能夠改變這一切。這就是他們不反對解僱工人的原因。他們和實行市場改革的人一致認為，社會主義的企業機構臃腫，人浮於事。

「後共產時代的結束」意味着這些「可有可無的」工人大多數都得走人。始於90年代末的第二波企業改組使他們離開了企業。政府在90年代初曾鼓勵企業（其中大部分仍是國有企業）不要開除太多人，或是允許它們主要通過自然消耗逐漸萎縮。政府不想看到大量解僱工人可能觸發的大規模政治騷亂，擔心到頭來還得由它們用新的福利支出去幫助這些工人。但是在1998年前後，當大多數東歐國家的經濟開始復蘇時，卻刮起了更加凜冽的企業停工風。甚至在捷克——90年代初它以明顯的人為方式維持着很高的就業水平——失業率也從1990年的0.7%上升到1999年的9.4%。波蘭的失業率從1998年的10.6%上升到1999年的15.3%（2003年又上升到20%）。

這就是許多工會活動家對工會的工作重新燃起熱情的原因。現在的企業已經不再僱用很多閒人，所以工會領袖也更願意承擔起為工人保住飯碗的職責。換言之，正是在工廠消除了過去的「國家社會主義」特徵的同時，它們也為工會動員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共產時代那些完全因為社會福利和社會穩定的緣故而僱用的工人，如今已經不復存在，擁有技能的上層工會領袖，也就不再把擔任工會活動家當成不光彩的事情了。

當我在2001年重訪梅萊茨市時，當地的情況已經大為不同。那家航空工廠在一年前被迫宣布破產，這不但是由於持續不斷的經濟困境，也是因為內部腐敗。但是它並沒有徹底關閉，經理和老闆利用破產法，徹底擺脫了他們仍要對工人承擔的責任，然後重新組織人員開工。他們在老地方建起了一個運轉正常的企業。現在被團結工會所代表的工人都是在破產之後僱用的——也就是說，在這些過去被工會領袖稱為「不務正業的」職工全都丟了飯碗之後。2001年我曾經見過面的那些工會幹部，對自己的工作又有了熱情，因為他們尊重這個更加重視技能和專業的工作場所。換句話說，由於後共產時代終於結束，工會運動現在很可能重新煥發活力。

## 六 工會復興的障礙

但是，它真能導致另一種格局嗎？儘管工會振興的可能性似乎日益增大，後共產時代勞動者的軟弱無力——這主要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現在是否會妨礙它重振旗鼓？勞動者現在是否受制於後共產時代的遺產，就像它過去受制於共產體制的遺產一樣？有許多證據顯示，確實有這種可能。

今天，工會的發展似乎面臨着三個主要障礙，它們都與後共產時代的遺產有關。可以把它們分別稱為意識形態障礙、組織障礙和結構性障礙。它們共同預示着，東歐的工會運動雖然表現出一時的復興，但這裏的勞動者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可能要比西方的工人更加軟弱無力。

所謂意識形態障礙，是指我前面談到的對工會的普遍不信任，它與舊體制有關，也與未必真正需要工會的想法有關。如上所說，存在着變化的迹象。但是討論這種現象的理論家依然寥寥無幾，因此也沒有多少人能夠改變社會期

共產時代工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意識形態方面是指對工會的普遍不信任。以前經常替勞動者喊冤叫屈的反對派活動家，現在卻把勞動者的困苦當作「一切正常」的標誌；討論階級的學者也把勞動者的邊緣化視為「正常」社會的基本特點。後共產時代的意識形態遺產，使人們很難克服這個時期甚囂塵上的反勞工潮流。

望。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有機知識份子幾乎蹤跡全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當階級又變成了一個現實問題、新精英們公然宣稱打算建設一個「規範的」階級社會的時刻，記者和學者們卻不太關注底層的處境了。在共產黨時代經常替勞動者喊冤叫屈的反對派活動家，卻把勞動者在後共產時代的困苦當作「一切正常」的標誌。討論階級的學者主要關心的問題是辨認新精英，而把勞動者的邊緣化視為「正常」社會的基本特點，因此算不上甚麼問題。對西方的經驗研究得很少，對自由主義和新合作主義理論——它們證明了如何使工人與市場經濟融為一體，對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健康發展關係重大——也沒有多少興趣（少數從事這種研究的人很難發表自己的成果。我問過一個匈牙利的同行，他為何不把自己提交給國際會議並經常在國外發表的討論勞工和後共產時代工業關係的很多文章在國內結集出版。他回答說，沒有哪家出版社對此感興趣）<sup>⑩</sup>。換言之，後共產時代的意識形態遺產，使人們很難克服這個時期甚囂塵上的反勞工潮流。

我所說的「組織障礙」是指小企業的大量湧現，它們取代了過去那些一體化的大企業。無論是甚麼地方，在這種企業裏都很難組建工會，在後共產體制的環境下就更其如此，因為這時的工會從總體上說是一個十分可憐的形象。新型的工會幹部也許希望改變這種狀況，但他們進入這些企業的渠道不暢。甚至原有的國有企業的工會也受到嚴重削弱，因為私有化和企業重組意味着這些企業將變成無數個產權獨立的小企業，它們都會成為全新的經濟實體。工會的會員身份並沒有自動轉入這些企業，也沒有多少員工選擇重新加入工會。工會失去了老國企的根據地，在新的私有企業中又沒有基礎，因此，即使在更多的人開始歡迎工會時，也很難把它們重新建立起來。

復興工會運動面對的結構性障礙，是指後共產時代形成的政治經濟新格局。博勒 (Dorothee Bohle) 和格雷什科維奇 (Béla Greskovits) 在一篇採用比較和歷史的雙重架構、內容豐富的實證文章中認為，並不是所有類型的生產過程都同樣有利於工會的成立，而1989年以後東歐的大多數新投資，都是出現在最不利於建立工會的產業中<sup>⑪</sup>。他們通過分析生產的八個不同變量及其對勞工力量的利弊之大小，揭示東歐如何形成了一種最不利於工會運動取得成功的「勞動密集型的投資產品產業」（與最有利工會成功的「資本密集型的消費品產業」相反）。因此，儘管國際資本確實促成了東歐的經濟轉型，甚至使其實現了「現代化」，它卻不太可能導致工會勢力的壯大，更不用說發生在西方的那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新合作主義了。博勒和格雷什科維奇總結道：「與西歐的產業結構有利於歷史性妥協不同，東歐的產業結構對歐洲社會模式的東擴構成了嚴重的限制。……〔西方的〕社會模式沒有進入東歐，是因為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沒有東移。」換言之，東歐後共產時代的工業化形成了自身的結構性遺產，它阻礙着勞工運動的復興。

可見問題在於，儘管出現了一些工會復興的跡象，工會的軟弱無力仍將繼續下去。西方工會的勢力近年來也在不斷下降，但仍存在着高傲與好戰的傳統。東歐的問題不在於1989年以後工會勢力的下降（很難說共產黨豢養的工會是強大的），而在於1989年後它們被塑造成了一個軟弱無力的角色。1989年後的遺產是很難動搖的。

復興工會運動面對的結構性障礙，是指後共產時代形成的政治經濟新格局。與最有利工會成功的「資本密集型的消費品產業」相反，1989年以後東歐形成了一種最不利於工會運動取得成功的「勞動密集型的投資產品產業」。儘管國際資本確實促成了東歐的經濟轉型，卻不太可能導致工會勢力的壯大，更不用說發生在西方的那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新合作主義了。

## 七 貴族式工會的興起？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主要強調了工會運動的「主觀」障礙。工會領袖對工會應當做些甚麼有清醒的認識嗎？他們真的相信工會很重要嗎？普通工人是否認為工會有用？概言之，一個既定社會對勞工運動普遍持有的意識形態態度，對於勞工運動是否能夠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對工會的必要性沒有強烈的信念，就不會有願意從事這種工作的活躍份子，這種工作也就不足以說服另一些人參與其中。

理論界很少關注工會成功的主觀因素，因為大多數從西方角度研究這個問題的社會科學家都簡單地假設，總會有工人願意為勞動者的經濟和工作利益而奮鬥，現在的工會做的就是這些事情。後共產時代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在1989年以後的東歐，到處都是不習慣於為勞動者利益而奮鬥的工會，到處都是不認為這種奮鬥有何重要性的工會活動家。後共產時代的結束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隨着年輕工人有了不同的工作經歷，以及私有化和企業重組終於淘汰了原來的工作場所，有意領導工會的技術工人，也開始着手於真正的工會工作了。

不過需要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即使該地區初步的工會復興取得了成果，它也將是一種新型的工會。它不意味着回到過去。新的工會不會是代表企業全體工人的大型產業工會——這是後共產時代的工會從共產社會繼承下來的模式；它更有可能成為代表有技術的工人精英的小型工會，即服務於工人新貴的工會。這種工會現在主要出現在一些已經把很多在共產黨時代就業卻缺少技能的工人辭退的企業，這裏的技術工人逐漸認識到，工會可以做一些除了維護缺少技能的工人以外的事情。

隨着製造業企業變得更具「生產力」、僱用了更多的男性，這些部門的工會活動家（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技術工人）也變得更加樂意擔任自己的角色。他們終於能夠把工會改造成他們過去嚮往的那種「生產者的組織」了。換言之，在經歷了停工、資產縮水、結構調整、理順生產、有時甚至是破產之後，工會也許會重新出現在私營的製造業企業之中，成為比後共產時代更有作為、更加果斷的工會——一個有別於其他群體的社會團體的代表。然而，這也意味着新的工會是建立在對階級團結的否定上。西方的工會往往是從最初的技術工人的行業工會，演變為促進廣大的階級利益的組織，而正在復興的東歐工會卻很可能主要成為單純保護技術工人的組織。它們可能非但不去避諱工人貴族的身份意識，反而接受這種身份。它們不會試圖表達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因為它們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才擺脫了這種責任。

就此而言，未來的局面有可能類似於墨西哥或委內瑞拉，那裏的工會主要代表重要經濟部門的技術工人，最貧窮的工人很少參加工會。邊緣部門的勞動者也許會嘗試成立自己的工會，但是沒有國際社會的實質性參與，他們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為國內的工會活動家一直盡量同這群「缺少技能的」人保持距離（其實，在大型超市無技能的零售業工人中間之所以能夠成立工會，很大程度上

即使東歐地區初步的工會復興取得了成果，它也將是一種新型的工會。新的工會不會是代表企業全體工人的大型產業工會；它更有可能成為代表有技術的工人精英的小型工會，即服務於工人新貴的工會。新的工會是建立在對階級團結的否定上。它們可能非但不去避諱工人貴族的身份意識，反而接受這種身份。它們不會試圖表達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因為它們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才擺脫了這種責任。

是歸功於國際工會組織的參與。儘管如此，它們的進展仍然有限)。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現在這些國內的工會領袖不太可能認真關注這個群體，雖然他們偶爾也會為取悅西方同行而裝裝樣子。總之，即使東歐的工會運動能夠重整旗鼓，它也很可能並非建立在過去形成的階級團結之上。

## 八 東歐和中國的比較

在結束本文之前，與中國做一些初步的比較是有益的。因為我擔心一些中國的讀者，尤其是那些關心勞工的讀者，在看到我對東歐工人軟弱無力的評價後，會以為中國工人的「軟弱無力」和東歐一樣。東歐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那兒的政府確實十分嚴肅地看待勞工問題。三方協商制度雖然虛幻，但它是政府重視勞工問題的標誌。它們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些安撫勞工的努力，這總要勝過中國政府拋下工人不管的做法。僱主和政府可能使工會的組織工作變得更困難，但工會無論何時何地都能組織工人，獲得外國的援助，這種權利是絕對得到承認的。中國很多勞工的薪水雖然有所增加，但他們的處境要比這差多了。

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一個原因是，東歐與中國不同，它是在尚未出現資本家以前就開始建立資本主義<sup>②</sup>。當這些國家還不存在一個能夠僱用失業工人的階層時，它們就開始了資本主義轉型。此外，當它們開始轉型時，勞動者作為一個象徵性特權階層的遺產依然完好無損，在摧垮共產制度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波蘭團結工會，甚至為這份遺產增添了更大的力量。至少與中國相比，改革者得小心翼翼地前行，這既是因為工人沒有其他出路，也是因為勞動者殘存的尊貴地位使政府至少要給工人造成一種象徵性的歸屬感，更是因為政黨需要在工人中間拉選票。

中國在這些方面看起來十分不同。它的市場化方案，是與資本家而不是試圖建立資本主義的官員一起上路的。第一批資本家是海外華人或通過在國內市場出售產品致富的農民。政府官僚當然是這種新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但他們不像東歐的官員那樣，只擔任給市場化助威的啦啦隊，而是作為投資者參與其中。城市的黨政官員與外國投資者密切合作，結果自己也變成了資產階級。人民解放軍成立公司的做法，使許多職業軍人變成了初露鋒芒的資本家。可見，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是一些擁有經濟資本的人，而不是希望培育一個資本家階層的政治家。這樣一來，東歐的政治家必須安撫工人，因為不存在一個能夠按照自己的條件在自己的企業裏僱用這些工人的投資者階層，而中國政府卻能乾脆撕毀它的社會契約——「鐵飯碗」，「讓市場說了算」。中國的數百萬工人很快就拋棄了原來的國有企業，其實後者也已經拋棄了他們。他們各自另謀出路，投奔那些打算僱用他們的躊躇滿志的新資本家。而東歐的工人除了少數非正式的部門外，幾乎無路可走（只是到了90年代中期，真正的私有部門的僱工人數才開始增長）。跑到西歐去是一條出路，但並不是十分合法，即使在歐盟東擴以後，大多數西歐國家也不允許東歐人自動獲得工作許可。因此，對工人完全置

東歐在尚未出現資本家以前就開始建立資本主義，東歐官員只擔任給市場化助威的啦啦隊；中國政府官僚則是新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城市的黨政官員也變成了資產階級。這樣一來，東歐的政治家必須安撫工人，而中國政府卻能乾脆撕毀它的社會契約——「鐵飯碗」，「讓市場說了算」。中國的數百萬工人很快就拋棄了原來的國有企業，投奔那些新資本家；而東歐工人除了少數非正式的部門外，幾乎無路可走。

之不理而又不想引起政治後果是不可能的。國家仍要關心他們，讓他們有合法的途徑為自己尋找出路。

東歐和中國對待工人的態度不同的另一個原因是，共產制度在這兩個地方有着不同的含義。東歐的共產制度一直同工人有着內在聯繫。俄國革命以及東歐共產黨在戰後接管政權時，都是打着工人的旗號，甚至反對派也知道，要想獲得影響力，就得自稱「代表工人」。中國當然也讚美「工人和農民」，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卻有着民族主義這樣一個核心因素，它在東歐社會是無足輕重的。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激進主義一貫強調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共在組織抗戰期間十分成功地利用了這種志向（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希望俄國戰敗形成了鮮明對比）。共產黨把它在中國取得的勝利說成是民族解放的時刻，而蘇聯和東歐則把這種勝利稱為建立工人政權的時刻。中國的共產制度主要同國家聯繫在一起，而它在東歐主要是同工人聯繫在一起。

這就意味着，中國在拋棄工人的同時，仍能自稱忠實於它的歷史和遺產。它甚至仍能自稱「共產體制」，因為它的共產體制意味着民族主義而不是工人的解放。職是之故，只要新政策有利於國家和民族，中共在拋棄工人時就有理由不把這種做法視為對自身歷史身份的挑戰。

在東歐，對工人的責任感是來自於一種集體的潛意識。既然代表勞動者的口號對於掌權的共產黨和反對派同樣重要，所以即使現在他們也不能如中共那樣輕易拋下工人不管。

可見，輸家說到底是東歐的工人和工會。與西歐的同伴以及自己不久前的處境相比，他們變得更加軟弱無力了。但是，如果以中國的眼光看，他們的處境還不算太糟，那也不難理解。

桑迪 譯

東歐和中國對待工人態度不同的一個原因是，共產制度在這兩個地方有着不同的含義。東歐的共產制度一直同工人有着內在聯繫；但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卻有着民族主義這樣一個核心因素，它在東歐社會是無足輕重的。共產制度在中國主要同國家聯繫在一起，而它在東歐主要是同工人聯繫在一起。這就意味着，中國在拋棄工人的同時，仍能自稱忠實於它的歷史和遺產。

### 註釋

① “What Happened in Eastern Europe in 1989?”,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ed. Daniel Chiro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5.

② Peter Gowan, “Neo-liberal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astern Europe”, *New Left Review*, no. 213 (September-October 1995): 3-60.

③ Branko Milanovic,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8).

④ 對早期團結工會運動的基本介紹，參見David Ost,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Opposition and Reform in Poland since 196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orig. 1982); Jan Kubik,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The Rise of Solidarity and the Fall of Socialism in Polan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man Laba,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⑤ Wojciech Arkuszewski, “Od góry do dołu”, in *Tygodnik Solidarnosc* (22 September 1989).

- ⑥ 對後共產時代波蘭勞工問題的詳細說明，參見David Ost,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⑦ 有關不同國家的詳細情況，參見Stephen Crowley and David Ost, eds., *Workers After Workers' States: Labo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 ⑧ 關於歐洲後共產時代的社會政策，參見Bob Deacon, ed., *The New Eastern Europe: Social Polic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s Angeles: Sage, 1992); Mitchell Orenstein, *Out of the Red: Build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另外，對於從共產黨時代直到今天的福利政策的變化過程，一項出色的人種學研究是Lynne Haney, *Inventing the Needy: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in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⑨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1994), chap. 9.
- ⑩ 對這些問題的更全面討論，參見David Ost, "Illusory Corporatism in Eastern Europe: Neoliberal Tripartism and Postcommunist Class Identit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28, no. 4 (December 2000): 503-30.
- ⑪ David Stark and László B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4.
- ⑫ 1997年12月在布達佩斯與工業關係專家洛多(Maria Lado)的談話。
- ⑬ Jonathan Stein, "Neocorporatism in Slovakia", in *Workers After Workers' States*.
- ⑭ Grigor Gradev, "Bulgarian Trade Unions in Transition: Between a Free-Range Hedgehog and a TV Tiger", in *Workers After Workers' States*.
- ⑮ David Ost and Marc Weinstein, "Unionists Against Unions: Towards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3, no. 1 (Winter 1999): 1-33; Guglielmo Meardi, "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 East and West: A Comparison of Fiat Factories in Poland and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 no. 3 (1996): 275-302; Paul 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From Solidarity to Infirmi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 ⑯ Crowley and Ost, *Workers After Workers' States*, 230.
- ⑰ 1994年5月在麥萊克市的交談。
- ⑱ 2003年在布達佩斯同諾伊曼(László Neumann)的交談。
- ⑲ Dorothee Bohle and Béla Greskovits, "Capital, Labor,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in the East", Working Paper no. 58 in Program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Working Paper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rch 2004.
- ⑳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1998).

**奧斯塔 (David Ost)** 美國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政治學教授，匈牙利布達佩斯中歐大學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訪問教授。主要研究東歐的民主化及政治經濟學，尤其關注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著有*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1990)、*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2005)，並編有*Workers After Workers' States: Labo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2001)。